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Northern Song, 1085–1125

方诚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Northern Song, 1085–1125

方诚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 方诚峰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1-26612-0

I. ①北… II. ①方… III. ①政治体制—研究—中国—北宋 ②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3042 号

书 名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著作责任者	方诚峰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612-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晚期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起于宋神宗熙丰变法之后,终于北宋灭亡之前。在该领域,已有的研究重点是相当明显的:政治制度、党争及其反复、腐败与亡国三个主题。从大的面貌上来说,多年前寺地遵指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偏颇与断裂^①,至今还依稀可见。在笔者看来,除了政治制度,其他两个主题主要围绕权力斗争、利益攫取而展开。其最大的偏狭,乃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

然而无论是揆以当代“政治科学”的基本关切(权力、合法性、主权、权威等),还是某些“政治哲学”流派的关怀(美德、公正等)，“政治”所可能包含的内容是多层次、多样化的,这就衬托出以“权力斗争”或“利益争夺”为主线的政治史有待反思。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推进,有赖于在研究视野、主题上超越上述狭隘性,即把党争、腐败等问题置于更具有分析性与包容性的视角之下。这是本书选择“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视角的原因所在。本书不是要否定北宋晚期政治斗争的激烈性或其他政治上的困境,而是试图说明,政治分裂、腐败只是现象,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变化。

那么,什么是本书所谓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呢?

“政治体制”是为了强调政治制度与人的结合。本书虽然会探讨不少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但不以厘清制度本身为目的,而是试图呈现人的活动与制度架构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体制。钱穆在谈“如何研究政治史”时说:“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②所谓当时之史事,即人的活动。十余年前,邓小南师提倡“活”的制度史研究,特别强调从“关系”着眼,既有人与制度的关系,也有制度本身的关系,从而加深对于“政治机制”的整体认识^③。这正是本书所努力追求的。另外,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词之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

^①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意识”,第6页。

^②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

^③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原刊《浙江学刊》2003年3期,收入《朗润学史丛稿》,第502—503页。

代表大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专门的表述,从中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领导者、参与者、政治原则、多项行政制度等的综合工程,不会有人误解为只是行政制度改革。

本书讨论的“政治体制”主要限于中枢体制——君主、宰执为主要活动者。以君主为中心者,本书将主要论及垂帘、御笔、应奉;以宰执为中心者,主要涉及三省、平章军国(重)事、公相。当然,“体制”一词本身就强调整体性与关联性,以上两个层次的问题并非孤立展开。

“政治文化”的定义,以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代表的美国“政治科学”派(行为主义)的说法最为有名(态度、信仰、情感),但从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数据搜集与分析)和对象(公民的政治参与)来说,这一传统并不很适用于中国古代。同样,法国的社会学传统或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也并非自然地适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①。实际上,被认为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诸多著作之间,其异质性远远大于同质性,或许能取得一致的就是认为“文化”是支配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

本书的“政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治理论或主张,通常是系统的、明确的,比如本书将特别探讨司马光的整体政治主张。二是政治理想与口号,如大有为、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等。相比理论或主张,这些理想、口号的笼罩面更广、支配力更强,但不同人、不同时的阐述、实践又大相径庭。有一种假设认为,利益及围绕利益的斗争,应该是政治史研究的永恒主题,政治史不能纠缠于那些看似高远的政治口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利益之争固然是永恒的,但每个时代的政治史却都是独特的。将每个时代政治史区分开来的,正是那些政治口号——其实是每个时代独特的政治运作原则的反映。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说,一套新的政治词汇的出现及其为人所议论,正说明了一个社会开始自觉掌握一种新的政治概念;而政治的行动或规划,都不得不适应现有的词汇^②。三是在上述主张、口号影响下的政治情绪或取向,如安静与有为、宽容与严酷等等。这三个层次不仅是一些政治的“原则”,也始终伴随着“实践”,尤其是后两个层次,无法脱离政治实践而孤立存在。故一言

^① 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三个谱系,见迈克尔·布林特(Micheal Brint)《政治文化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在中文著作中,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主要采用了阿尔蒙德的观点,但在操作上则重在探讨政治思想对实际政治生活的影响(第4—6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亦强调文化史与政治史的互动关系(自序一)，“兼顾政治与学术两个方面”(自序二),但作者并未将重点放在具体的政治思想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上,而是强调带着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如何参与现实政治,即如作者所说,政治文化“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第5页)。

^②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前言,第2、4—5页。

以蔽之,政治的原则、相应的政治实践,就是本书所主张的“政治文化”。

二

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正是神宗朝熙丰变法之后、北宋灭亡之前的时段。有关这一段的政治史,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处于一个传统与新态杂陈的状态。所谓传统,主要指传统的解释框架仍然在影响着多数实证研究。就政治体制而言,君权走向专制还是虚化始终是很多研究的终极关切;就政治演变而言,从新旧党的反复倾轧走向徽宗朝的腐败与亡国是最为基本的理解线索。

所谓新态,指不少具体的研究正在逐渐地改变整体的理解。尤其是在党争、徽宗及其时代、宋代中枢体制这几点上,学界的进展最多。本书各章节在探讨具体问题,都会提及相应的学术史,故以下仅对最近的总体趋向作概览式的观察。

首先,对于北宋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新旧”之分裂为何会发生,或者为何“新法”会出现,1949年以后主流的认识是阶级矛盾说,一度还流行儒法斗争说,但当下的学界更为重视熙丰变法的儒学复兴运动背景,认为变法的发生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①。这对于理解整个北

① 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第15页。钱穆《国史大纲》,第649—659页。钱穆《王荆公的哲学思想》《论明道与新法》,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第55—76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13—477页。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九章“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第十章“北宋唯心主义道学的形成”,第420—544页(亦以阶级矛盾说为基础)。W. Theodore De Bary, “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Arthur Wright,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pp. 93—106。邓广铭《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宋史研究论文集》(一九八四年年会编刊),第1—19页;修改稿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29—139页。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第125—154页。刘复生《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6期,第114—119页。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287—323页。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七章“为了完美的秩序——王安石和司马光”,第222—265页。(原著“*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出版于1992年。)包弼德《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观点》,载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第111—183页。(原文“*Government, Society, and State: The Political Visions of Ssu-ma Kuang and Wang An-shih*,”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Edited by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5期。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1—29、281—450页。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尤其是第六章,第318—398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3—315页,尤其是第六章“秩序重建——宋初儒学的特征及其传衍”。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史学集刊》2006年1期,第10—12页。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第40—48、173—201页。(转下页)

宋后期政治史的“意识形态”背景^①，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其次，对史料形成过程的探讨说明，自北宋至南宋长期的官、私历史编纂所塑造的图景颇有被扭曲之处^②。这种扭曲，尤其体现在将北宋晚期塑造为一个君子小人之争的时代，而且以小人的获胜与王朝的崩溃为终局。但不少研究表明，北宋晚期的新旧、邪正、君子小人的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当时及事后的“话语”^③。“朋党”或“党争”，无论是从所谓的“新党”“旧党”之分，

(接上页)要注意的是，诸说意见不一，目前对于宋代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远未达到充分的地步。

- ① 政治、法律学界关于“意识形态”(Ideology)的概念并未有一致的阐述。其中一些学者不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定义，而将其视为与“理念体系”“符号体系”“信念体系”同义的中性、描述性的概念，本书在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也持这个立场。参见帕特里夏·埃维克《意识与意识形态》，收入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第89页。
- ② 关于北宋后期实录、国史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形成的研究，成果尤其多。如：黄汉超《宋神宗实录前后改修之分析》(上、下)，《新亚学报》7卷1期，1965年2月，第367—409页；7卷2期，1966年8月，第157—195页。胡昭曦《〈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1期，第71—78页。林天蔚《北宋党争对实录修撰的影响》，《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5期，1983年5月，第141—151页。裴汝诚《关于北宋后四十年史料的整理研究》，收入氏著《半粟集》，第297—305页。裴汝诚《宋代史料真实性刍议》《论宋元时期的三个王安石传》，俱收入氏著《半粟集》，第88—135页。裴汝诚《〈迺英奏对〉质疑》《〈迺英奏对〉献疑》，俱收入氏著《半粟集》，第172—193页。李则芬《神宗、哲宗二朝史事多谬》，氏著《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第272—341页。许沛藻《宋高宗与神哲实录》，《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第625—632页。近藤一成《“洛蜀党议”と哲宗实录〈宋史〉党争记事初探》，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中国正史の基础的研究》，第311—334页。平田茂树《〈哲宗实录〉编纂始末考》，载《宋代的规范と习俗》，第29—66页。Charles Hartman, “The Reluctant Historian: Sun Ti, Chu Hsi, and the Fall of Northern Sung”, *T'oung Pao*, Volume 89, June, 2003; pp. 100—148. “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Politics*, pp. 517—564.
- 其他如邓小南《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辨伪》，《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4期，收入《朗润学史丛稿》。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1—6章，第3—222页。张其凡、金强《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3期，第111—118页。方震华《战争与政争的纠葛——北宋永乐城之役的纪事》，《汉学研究》29卷3期，第140—150页。再如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辩奸论》真伪讨论，参见王昊编著，曾枣庄审定《〈辨奸论〉真伪考信编》。
- ③ Ari Daniel Levine,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亦参见李华瑞前引著作。

还是从各自的“内部”来看,实际阵线、结构都非常复杂,而且远非固定^①。既然如此,研究者必须最大限度地跳出历史书写的塑造,去寻找北宋晚期政治的实际逻辑。

再者,就徽宗及其时代而言,近十年来出现了多部论文集或专著^②,加上大量的论文,正在改变北宋政治史研究后不如前的不均衡局面。这些研究观点各异,但新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一是大大拓展了材料面以及研究课题,尤其是将图像等视觉材料纳入了视野。二是能从更为理性、冷静的立场评判徽宗朝的政策、政治,不再满足于贴黑暗、腐败之类全盘否定的标签。三是从各自的立场注意到了从神宗到徽宗朝政治史的连续性,徽宗朝不再被视为一个孤立的腐朽时代。

最后,关于宋代的中枢体制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最可注意者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早期强调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到如今将两者视为同一权力结构的

① 比如: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清华学报》新2卷1期,1960年,收入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17—142页。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学术研究》1983年6期,第63—71页;收入氏著《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罗家祥《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的政局演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2期。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三卷,第451—484页;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载《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82—186页,两文俱收入《朗润学史丛稿》。李涵《从曾布根究市易违法案的纷争看新党内部的矛盾与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一九八四年年会编刊),第267—281页。裴汝诚《曾布三题》,原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入氏著《半粟集》,第194—207页。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58—72页。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载《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第351—369页。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宋代朋党形成之契机》《从刘摯〈忠肃集〉墓志铭看元祐党人之关系》,俱收入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57—160页。梁思乐《朔党与北宋元祐朋党政治新论——以元祐五年以前朔党与韩忠彦、文彦博、范纯仁的关系为中心》,《“10至13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6届年会论文集》第二组,杭州,2014年8月,第100—123页。

② 比如:伊原宏等《アジア游学》64特集《徽宗とその时代》,勉诚出版,2004年6月。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atricia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王耀庭主编《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藤本猛《风流天子と“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4年。Patricia Ebrey, *Emperor Huizo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组成部分^①。二是在密集的反思之后^②，“运作”成为中枢体制研究的主要关切，而作为政治运作产物的“公文”也成为热门的分析对象^③。总体而言，大概现在很少有学者会满足于以剪裁、重现志书、政书的内容为制度史研究的目标。

本书就是在上述趋势的基础上展开的。不过，虽然学界对于新旧、邪正、君子小人这样的二分法有了足够的警惕，但对于神宗去世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演变脉络，又很难进行超越新旧党争的理解。再者，学界虽然注意到了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连续性，但又很难避免从靖康之难倒推北宋后期逐步沉沦的过程（即“辉格式”的历史解释），或者完全将北宋的崩溃视为偶然，从而将徽宗时代理想化。复次，在中枢体制的研究上，如何超越君相权力大小论

① 参见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皇权论综述”，第295—379页；本书的前身是作者2001年于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的《宋代的皇权与士大夫政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京都学派所谓的近世“君主独裁”之概念，强调的其实就是君主统辖下的官僚制整体。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第191页。又参见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第3—4页；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书评：王瑞来著〈宋代皇帝权力和士大夫政治〉》，收入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25、51页。

② 近年来，宋史学界针对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作了许多反思。最主要的有：（一）“活的制度史”“动态的制度史”，见邓小南师《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原刊《浙江学刊》2003年3期，收入《朗润学史丛稿》，第497—505页。亦见包伟民《走向自觉：关于深入拓展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代前言，第1—9页。（二）“政治过程论”“政治空间论”：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意识”，第18—20页；同作者《宋代政治史研究方法试论——治乱兴亡克服のために》，《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第79—80页。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评》，《日本宋代政治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收入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43页。（三）“新政治史”“日常政治史”：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中国史研究》2009年4期，修改版收入氏著《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再探索》，第1—14页。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6期，收入《朗润学史丛稿》，第515—524页。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较早提出“日常政治”的是侯旭东教授，见《读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8期，第29页。

③ 比如：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王化雨《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8年。《汉学研究》27卷2期“宋代的讯息与政令运行”专辑，台北：2009年6月。张祚《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9年。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2期。邓小南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小林隆道《宋代中国的统治と文书》，汲古书院，2013年。田志光《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行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

的思路,也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因此,具体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的同时,总体的认识框架也亟待再探索。

本书试图重新梳理北宋后期纷繁的政治演变过程,在框架上则强调当时政治自身的逻辑。而要理解这一逻辑,首先就必须从政治文化入手,即要深切体会北宋晚期君臣的政治原则与他们的实践之间的分合。本书的论述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试图说明其多层次(君主、士大夫、统治成效)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本书认为,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重视所谓自身的逻辑,还应立足于当时政治体制独特的展开方式去理解时人的政治选择与相互关系。本书试图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主权力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三

哲宗、徽宗两朝政治史由元祐(1085—1094)高氏垂帘、绍符(1094—1100)哲宗亲政、徽宗统治(1100—1125)三个时期构成。

本书第一、第二章主要涉及高氏垂帘时期。第一章“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分疏了所谓元祐政治路线的内涵,也是元祐政治的起点。本章首先分析了神宗去世后不同人的立场,指出了为什么全面罢废熙丰新法在当时是“少数派”的主张,却成为朝廷的选择。其次,本章详细剖析了司马光的政治设想,以说明元祐之政在“破”熙丰之政外,还有“立”的一面,有自己的蓝图。最后,本章分析了熙宁、元丰、元祐三个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动,特别强调了元祐“垂帘体制”下差等有序的权力格局对于“元祐更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主要分析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首先探讨了为什么元祐前期“党争”层出不穷,即诸多元祐朋党主要不意味着实际的政治集团,而是多存在于议论之中,是某些政治观念、政治诉求之反映。其次,本章解释了为什么经历了元祐八年之后,“绍述”得以迅速实施。原因就在于元祐政治路线在后期逐渐显露的危机:力主有为、反对权宜的主流政治文化暗潮涌动,而作为非常之制的“垂帘体制”则日益面临崩解的危险。

第三章“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从君主与士大夫两个角度探讨了哲宗亲政时期北宋政治文化的质变——士大夫政治的失败。首先,从君主的角度,北宋中后期的“致君尧舜”本质上强调君主作为一个政治、道德、秩序符

号的非人格化,但随着哲宗的成年、亲政,形势剧变,这一理想宣告失败。其次,从士大夫的角度,本章从哲宗亲政后对士大夫的“文字”审查为切入点,分析了“一道德、同风俗”这一理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异化。

第四、五、六章都涉及徽宗朝政治史,基本的关切是:徽宗究竟如何超越父兄之治?本书从统治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第四章“徽宗朝的权力结构”,从权力实际操控与象征两个层次探讨了徽宗朝的君主角色。就实际操控层面而言,徽宗朝通过长期的实践,找到了一种妥善使用并控制蔡京的方式——公相制度。从象征的层面而言,本章重新探讨了徽宗朝的御笔、御笔手诏,认为御笔、御笔手诏的关键变化在于呈现的方式,而非流程——以内批、手诏这两种王朝政治中常见的文书为介质,在既有运行程序的基础上,突出政令颁行中“御笔”的存在,从而展现徽宗君临天下的政治姿态,塑造君主自身与整个王朝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五章“徽宗朝的‘应奉’”。一是讨论了徽宗朝所谓“应奉御前”的缘起与实质,即主要是应付东京城庞大的土木工程与礼乐制作,而非应徽宗个人私奉;也分析了常被视为徽宗享乐借口的“丰亨豫大”这一政治口号的意义,即宣扬由理想的君主、大臣、统治成效所构成的“圣治”。二是探讨了“应奉”财政体系逐渐独立的过程,即它如何与当时的“经制东南”一起成为一种新的财赋征调方式,也为南宋重建提供了重要财政基础。

第六章“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分析了徽宗朝对自身的历史定位。一是分析了“道家者流”,即方士、道士在徽宗朝政治中为何兴盛——既有宫廷政治的需要,更是营造“圣君”的需要。在君主的形象、自我定位上,徽宗通过宗教手段超越了神宗、哲宗,达到了“神性君主”的全新境地。二是探讨了徽宗朝创造性的祥瑞体系,即其日常性与当代性,从而展现、营造王朝的“圣治”。本章也可视为对北宋晚期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回答:儒学复兴运动所追求的三代之治——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的“全书结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北宋后期政治演变的总观察,二是从技术与观念两个层次对帝制政治中“君主权力”的再认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	1
第一节 从元丰到元祐	1
一 熙丰臣僚	2
二 异议之人	4
三 高氏的立场	8
四 本节结语	10
第二节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	11
一 君主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变革的起点	12
二 英宗朝的老、新问题	16
三 神宗朝的难题及应对:政体与得人	21
四 元祐更化与司马光的设计	26
五 本节结语	37
第三节 垂帘体制的确立	38
一 从熙宁到元丰的中枢	38
二 元祐三省:同取旨、聚议与“三省事通为一处”	44
三 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事	50
四 垂帘仪制与垂帘体制	54
五 本节结语	57
第二章 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59
第一节 元祐诸“党争”的再剖析	59
一 苏轼与程颐	60
二 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	68
三 车盖亭诗案	76
四 本节结语	80

2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第二节	绍述前夜	81
一	宰执的态度	83
二	高氏的部署	87
三	何人首倡绍述?	91
四	主流政治文化	94
五	本节结语	100
第三章	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	103
第一节	哲宗赵煦的经历及其意义	104
一	圣学:经筵之外	104
二	皇后:从孟氏到刘氏	112
三	疾病、子嗣与臣僚	118
四	本节结语	126
第二节	“文字”与新旧问题的“终结”	128
一	重修《神宗实录》	128
二	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133
三	政治整顿与“士类”之变	138
四	本节结语	141
第四章	徽宗朝的权力结构	145
第一节	“公相”蔡京	147
一	“公相”的出现	148
二	“公相”蔡京与三省宰执	150
三	从联金灭辽之议看蔡京与枢密院长贰	154
四	徽宗朝权力结构的调整	158
五	本节结语	163
第二节	御笔、御笔手诏及其政治意义	164
一	御笔与内批	165
二	手诏	168
三	御笔手诏	174
四	御笔、御笔手诏的政治意义	177
五	本节结语	187

第五章 徽宗朝的“应奉”	189
第一节 应奉的缘起与目的	190
一 徽宗朝应奉之起	191
二 政和以降的诸工程	198
三 “丰亨豫大”与“惟王不会”	204
四 本节结语	211
第二节 从应奉局到应奉司	212
一 应奉的两个方面及其配合	213
二 应奉财政的独立	223
三 本节结语	236
第六章 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239
第一节 “道家者流”	240
一 崇观诸方士	240
二 政宣道流与徽宗君臣	249
三 本节结语	259
第二节 礼乐与祥瑞体系	260
一 徽宗苑宥	262
二 礼乐之器	265
三 本节结语	276
全书结语	279
附录 关于曹氏、高氏反对新法几条材料的辨析	283
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305

第一章 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

元丰八年(1085)三月七日,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赵顼去世,十岁的幼子即位,是为哲宗赵煦;而神宗的母亲高氏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宋神宗留下的遗产,首先就是自熙宁二年(1069)开始的“新法”;与这些新法联系在一起则有所谓的“熙丰臣僚”;而在新法、熙丰臣僚的对立面,还有一些异议之人,双方之分裂就成为所谓的“新旧之争”。新法、熙丰臣僚、新旧之争这些神宗的政治遗产,就是本书所处理的政治史之出发点。

熟悉北宋晚期历史的人都知道,接下来的元祐时期,新法被全面推翻,熙丰臣僚之骨干被贬,新旧之分裂更深了。一言以蔽之,对熙宁、元丰而言,元祐政治路线可谓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但是,要真正理解这一转变,其实需要解释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宋神宗去世的时候,新法已经实施了十余年,当时人的态度如何呢?其次,罢废熙丰之政,这只是“破”的一面,元祐政治要“立”的内容是什么呢?最后,无论是破还是立,元祐时期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其贯彻呢?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了说明之后,才能真正理解所谓元祐“政治路线”之内涵。这正是本章的任务。

第一节 从元丰到元祐

本节要探讨第一个问题:宋神宗去世之时,人们对新法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看待“新法”作为一种已经推行的政策,二是如何看待“新法”所代表的更革有为之理念。后者将放在第二章进行讨论,本节主要谈第一个层次。

王安石曾说:“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①也就是说,随着新法的推行,“正反”双方的意见、阵线都在调整,有所靠拢。关于这个问题,罗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九五《曾布传》,第818页。

家祥已就若干人物作了较好的论述,并认为当时两大派别的冲突有缓和的可能^①。本节将在其基础上再作申论,特别要突出的是:既然有缓和的可能,为何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仍无法弥合?即作为权力核心的司马光、高氏,他们的特殊性在哪里?

一 熙丰臣僚

新法的支持者确实看到了“新法”有调整的必要。神宗刚去世,调整新法的呼声在“熙丰旧臣”中甚为明朗,也确实付诸实施了。王安石变法的主将之一章惇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对于役法,他认为“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②。章惇还说:“役法可以缓改,非如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③另外,据苏轼称:“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④神宗是否想改取士法当考,但至少说明章惇是认可其弊的。

此外,黄履也是新法的干将,神宗去世后,他与另一因新法而进者安惇谈及福建路盐法、茶法之弊,朝廷于是派出了陈次升、黄降分别去江南西路、福建路体察^⑤。

神宗去世时的宰相蔡确,在元祐元年(1086)罢相前曾有上表,史不载全文,但言官在弹劾他时有所引用:

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蜀省有司之烦碎,以安慰民心……严边备以杜二敌之窥觐……走使轺以察远方之疲瘵,如张汝贤、陈次升往福建、江西……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一道,以合众志之异同……^⑥

这六句话可看成是蔡确在神宗去世后的自我总结,分两个方面:一是对被排斥在外的臣僚略加引用,即所谓“收拔当世之耆艾”,“合众志之异同”;二是对神宗之政略加更改,以合民心。虽然其表被孙觉以“自陈功劳,颇更矜伐”为由逐条批驳,但其自陈的内容仍是有迹可循的。

①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84—89页。罗氏所论人员主要是:蔡确、章惇、苏轼、范纯仁。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条,第8828、8829页。

③ 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五,第733页。

④ 《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第1427页。

⑤ 《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丁丑条,第8477页。

⑥ 《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甲申条,第8811页。